



我的跨文化 人生使命

馮敬道

過去8年，我們夫婦二人參與非洲內地會在肯尼亞的事奉。前六年，我們在一個鄉村聖經學校任教，訓練和裝備當地的信徒領袖及牧職同工，使他們在教會有更好的事奉。最近兩年，我們參與一項更具挑戰性的工作，轉到北部圖爾卡納族（Turkana）居住之地，協助一位資深宣教士為當地的兒童開辦一所高中。每天都遇到很多生存威脅，幾乎全來自附近村莊的干擾。雖然，到不同的文化當中宣教，一直都是個極大的挑戰，但我們從中學到了許多寶貴的功課，並且依然相信這是神要我們來的地方，以及神要我們做的事情。

筆者相信自己參與跨文化的宣教事奉，並不是偶然的。回顧以往，神在不同的時間裡，藉著周遭不同的人來塑造我的生命方向，就是為了今日的事奉。Robert Clinton博士在《領導發達理論》（*Leadership Emergence Theory*）一書裡提到「使命」時指出，「是由一系列的過程塑造而成，就是一個人過去所經歷的一些有意義的事件、人物、獨特的境況或時間」。我們相信，神呼召信徒無論到宣教工場或全時間事奉，都基於神所定的時間；但一個人在蒙召之前，神很早已經為了這個呼召而裝備他。

筆者在跨文化環境中事奉的使命，是由很多人和事件所塑造的。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，是神把筆者放在多元文化的環境裡生活和成長。筆者在新加坡出生和成長，在那裡渡過了生命的塑造期。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、多文化的國家。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，筆者學會了與其他族群同處，並懂得欣賞他們的文化。

但其中最重要的是，家庭為筆者的跨文化宣教事奉奠定了基礎。筆者小時候，父親是新加

坡一個華語教會的主任牧師。在他的領導下，教會成為當地少數幾個有自己的宣教會議，和支持世界各地宣教事工的教會之一，並持續至今。為了推動教會在本地福音工作以外，放眼世界的需要，父親親自到海外參與及觀摩不同文化的事工。當他從漢城（今稱首爾）和印尼短宣回來時所表現出的興奮和改變，筆者至今歷歷在目。他參加短宣，帶回來的不僅是他個人的更新和跨文化事工的異象，對筆者未來的全職事奉和參與宣教更有著深遠的影響。筆者雖已忘記了說話的細節，但他對宣教工作的興奮，讓筆者知道神會透過短宣的經歷去改變一個人。他也給筆者樹立了榜樣，可以跨出舒適的生活圈子。

筆者踏上全職事奉，是受到父母親的鼓勵，但並非因為他們是全職事奉的傳道人，而是他們願意讓神使用的心，成為其他人遵行神旨意的榜樣和典範；也並非他們經常教導，而是他們對神盡忠給予我們的鼓勵。2000年夏天，筆者和太太加入了非洲內地會，準備前去肯尼亞的時候，差不多同時母親便回到家與神同在，而父親則從教牧事奉的崗位上退休後不久。我們都在猶豫，是否應該留下來照顧父親？筆者很記得當時與父親的交談，他說雖然會感到孤單，也需要時間來平伏母親離去後的哀傷，但教會的弟兄姊妹會照顧他，最重要的是他有神的同行和安慰。他鼓勵我們到神所呼召我們前去的去的地方。他願意讓我們到工場去，減少了我們踏上宣教工場時對他的牽掛。若沒有了他的祝福和鼓勵，我們今天不可能專心於肯尼亞的事奉。

（作者在東非宣教）